



# 何兹全 学述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家学述

DANGDAI  
RENWEN SHEHUI  
KEXUE MINGJIA XUESHU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主编 林在勇

何兹全著 潘雯瑾整理

# 何 兹 全 学 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兹全学述 / 何兹全著 ; 潘雯瑾整理 . -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00.9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 林在勇主编)

ISBN 7-213-01682-2

I . 何… II . ①何… ②潘… III . ①何兹全 - 学术思想 ②何兹全 - 回忆录 IV .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029 号

## 何兹全学述

何兹全著 潘雯瑾整理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周向潮 胡学彦(特约)  
封面设计 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 叶 宇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2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82-2/K · 488  
定 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001.5.18  
北京图书大厦  
No. 0489384



何兹全和夫人郭良玉合影



何兹全先生在书房

目 录

MULU

何兹全  
学述

前 言	1
青少年时代：辗转求学，增知启蒙	6
北大四年：潜心求索，一生难再	11
求学生涯	12
《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	18
《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	27
《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	30
《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的研究》	34
留学日本：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	45
抗战时期：战火中的求索	48
书生意气写政论	48
颠沛流离中偷安治学	55
史语所觅得一张安静书桌	61
三篇文章	64
求学美国：学欧洲史，为治中国史	80
回国十五年：大胆提出汉魏封建说	87
《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	94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	102
<b>十年浩劫：大革文化之命的年代</b>	110
<b>新时期：桑榆晚晴逢盛世，不用着鞭自奋蹄</b>	115
学术活动	116
著书立说	135
<b>附 录</b>	
年 表	181
主要著作目录	192

## 前言

研究历史，写历史文章，就和用照相机照相一样，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漆黑一片。历史著作，越能真实清楚地反映历史客观实际就越好。最能深刻、正确反映历史客观实际的著作，就是最好的历史著作。

几十年来，我研究中国历史，也写了一些文章和书。我的这些文章和书，能多大程度地反映历史客观实际的真实情况，真很难说。我对中国史的很多意见、看法，和当代史学界师友们的看法多有不同。一些同志把我说成是持汉魏封建说者。其实何止封建，对氏族社会解体后的中国历史发展，我都有与人不同的认识。只是封建社会的起始时代问题，曾一再引起史学界的热烈讨论，显得特别突出而已。

对中国古代史发展变化的道路，有些不同于人的想法，书里已有叙述。为了使读者有更深刻的印象，下面把构成我“一家之言”的一些“独特见解”，先述说一下：

一、盘庚以前是氏族部落时期，盘庚以后氏族部落逐渐分化，出现氏族贵族，酋长的权力逐渐突出。周灭商时，还是周人的氏族贵族率领周的氏族和商的氏族联合起来

去建立新国。这时的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是以周的贵族为领导的商周两族的联合体或共同体。氏族组织仍是社会的单位组织。氏族组成社会。

春秋时期，氏族组织进一步分化瓦解。地缘组织逐步代替血缘组织。贵族、平民之外，有了依附民（私属、属徒）、奴隶。

如果要给这个时代一个名称，我称之为“早期国家时代”。它是由氏族部落联盟向古代社会的过渡。

二、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开始大变化。战国时期，城市、交换经济发展起来。城市交换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平静的农业、农村生活，进一步破坏、瓦解了氏族组织。地缘关系逐渐代替了血缘关系。贫富代替了贵贱。汉代城市交换经济继续发展。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严重。农民失业流亡，奴隶制发展。结果城乡经济衰落。这是中国的古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春秋战国之际才产生。

三、汉魏之际，中国社会又一次开始出现大变化。我曾写文章指出变化有四个方面：一是“从城市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二是“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三是“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是“从民流到地著”。战国秦汉城市经济发达，社会上的主要劳动者是自由民——农民和奴隶，社会主要问题是土地兼并，农民流亡。三国以后，城市交换经济衰落，城市大都消失，谷帛代替金属货币，自然经济占优势。自由民、奴隶转化为依附民，身系于主人的半自由者的身份。自然经济（江南例外），依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初突出的现象。土地兼并，农民流亡转为争夺人口（劳动

力)，农民被强制地依附在土地上(屯田、均田)。贵贱身份再次出现，“士庶之分，实自天隔”。

这次社会变动是古代社会到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变动。我写出了变化，变化后的社会我还没有写，正在写。

我这些“一家之言”，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这样那样的过头，需要修整。但我自信它在大轮廓上是符合这段历史的客观实际的。也和照相一样，我照的照片大体把客观物景都照出来了。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说过的一段话。我说：

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大约是我第一个提出。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我都要争这个第一。当仁不让。(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大史学》第3辑，1995)

这段话，说得不够谦虚。我应引以为戒。所以致此，实在是由于我的史学思想几十年受压，心理不平衡所致。读者谅我！

人，往往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不能客观，二是有所蔽。我最喜欢梁启超的一段话，他说：

“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这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清代学术

概论·自序》)

这段话说得好。人要想真正认识自己，首先要能做到“超然客观”、“力求忠实”。这是难能可贵的态度和精神。

人，认识客观，包括认识自己，靠感官，靠思维活动。感官、思维活动，总会有所蔽的。人所处的时代、社会、家庭，以及由此所聚成的道德、风俗、习惯、心态等等，都能使人有所蔽。“超然客观”、“力求忠实”，并不能使人无所蔽。《荀子·解蔽篇》，专谈人之所蔽。

人有所蔽，是历史现象。原始野蛮时代，人对客观世界对人类自己都了解很少，所蔽很多。随着人类的进步，对客观世界理解日多，所蔽就日少。智慧越高，所蔽越少。

著书立说、写文章，贵在有新意，尤贵在有创始性、突破性。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美籍华人张光直教授，在傅斯年、董作宾百年诞辰纪念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中央研究院内进行讨论要不要设立一个“蔡元培奖”，赏给每年全院中最好的一本书或一篇论文。这里所说“最好”一定要是真好，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一个人一辈子如果运气好也只能看到一两篇的这样好法。

他认为就先秦史的论文来说，可以有上百篇放入“最好”的范畴，“可是能够使用‘创始性’、‘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我只能找到两篇，这就是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和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二文”。

这话说得好！不过我要补充一句，所谓“最好”、“创始性”、“突破性”，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能最好最真实地反映历史客观实际。人写书写文章都想写出最好的，最

有“创造性”、“突破性”的，能否写出，就看你的论文能否最好地反映历史客观真实。

我自然希望我的著述、文章是最好的，最有创造性、突破性的，能反映历史客观真实的。但能否如此，要由读者、历史来作评价。自我估价是不作数的。

最后，我要感谢潘雯瑾同志对书稿的整理。他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而且做得很好。

1999年10月20日

## 青少年时代：辗转求学，增知启蒙

1911年9月7日(清宣统三年旧历七月十五日)我出生在山东菏泽城内西当典街家中。我父亲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我幼年时他在山东守备队做军官，驻地常常变动，我随母亲到过新泰、利津、平邑、泗水等地。读过私塾和小学。大约1925年回菏泽不久，就转入南华学校，插入高小一年级。那时菏泽城里的学校有省立六中、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城东南有个县立小学。六中、五师是公立，南华是私立。

南华校长曹香谷名兰亭，山东巨野人，我们习惯称他“香谷老师”。他是菏泽教育界思想比较进步的。他先后为南华聘请了两位思想进步的教员：一位是滕蒙园，教授国文，一位是刘文彦，教授历史。两位先生对南华学校进步思想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滕蒙园的感召力尤大。刘文彦只教书，不太从事组织活动。滕蒙园主要筹划了国民党的组织活动，南华的国民党地下党员大都是滕蒙园发展的，或由他发展的党员再去发展的。在滕、刘和香谷老师的影响下，南华有了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最早的地下党员有刘仰月、龚西岑、杨尚谦(友三)。还有几位，年级比我高，接触少，回忆不出姓名来。

曹香谷老师是个教书、育人的教育家。每天清早天色未亮之时，他就吹哨子把我们这些住校生从床上唤起来，领着我们在校内外跑步。跑完步，他又将我们带至大礼堂前。大礼堂前廊的柱子上挂了块小黑板，香谷老师每天都会在上面写几句古圣先贤的格言，给我们讲解，也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这对我们每个人一生做人处世都有很大的影响。有些话至今我还记得，如“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话到今天还是我待人接物的一些原则。一个人少年时期所受的品德教育堪为立身之本，潜移默化影响其终生为人，甚是要紧。

1926年暑假前，我从南华小学毕业。我们全班都升入南华初中一年级。但就在这一年，南华中学改为师范，我们都成为南华师范班的学生。

1926年底寒假春节前，我在杨尚谦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杨是国民党菏泽地下党员。在此之前我已是一个注意政治形势发展的学生，我比同班其他同学更关注国内局势和北伐的行军进程，每天都迫不及待地读报纸。后来索性到报贩子处取报，帮他往学校送，年轻的心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推进而激扬澎湃，我就是在这种思想情况下加入国民党的。我们最大的活动是动员地方土匪参加革命，扰乱军阀后方，不过我极少具体参与这项任务，常做的是帮着携带、运送党部印发的宣传品。这时期我第一次读了列宁的著作《远方的来信》，还有一篇改变党的名称为共产党的

文章。当时对其文章的内在涵义是似懂非懂，但对列宁说理透彻、步步深入的文风，则佩服得五体投地。

1927年，菏泽一带成为战场，北洋军和国民革命军杀个几进几出。1927年秋至1928年夏，菏泽学校停课一年。

1927年暑假后，正规学校没有开学，有人在文庙办了个国文补习学校。我们一群失学的南华学生就进了这所学校。学校有一位老先生讲授《诗经》，但姓名如今已是不记得了。对国学有了兴趣，便读了李笠和梁任公的国学书目，还弄来了《书目答问》，于是踌躇满志地计划、安排，想依照他们的书目一部部读下去。但我不具备这样读书的条件，大气候仍在革命，难觅其书；而我父亲是军人，母亲又不识字，毫无家学基础。193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入史学系时，仙槎大哥（何思源）还劝我说：“我们没有家学，不能和孟真（傅斯年先生）比，人家是书香人家，咱们有啥？”国学补习班上了半年，除《诗经》外，我只读了一部《左传》。在南华小学念书时，一位姓刘的国文老师曾用《左传句解》作课本，他不先讲，而是把我们一个个叫起来讲，最后他再通讲。学期刚开始，我们简直像读天书一样，半懂不懂，后来竟也读通了。从这位刘老师处，我受益非浅。在国学补习班，才读完《左传》。此外就没念书了。整天乱哄哄的，大家都忙着“革命”！

国文补习半年，寒假就转学到六中去了。六中并没有开学，只是把城里的学生集合起来，补补课。我只记得葛象一老师给我们讲《孟子》，别的课全不记得了。

动乱中的这一年间有一件大事，我加入了改组派，介

绍人是我南华的同学赵子骥（体裁）。改组派的总部在上海，他们办了一些刊物，影响最大的有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顾孟余主编的《前进》。改组派的汪精卫、陈公博后来都堕落为汉奸。

我读陈公博的《革命评论》比较多，它对我的思想、感情影响很大，具体文章现在已回忆不起来了，总之是从蒋汪两派的斗争出发，主张民主，反对独裁。现在记得比较清晰的是他的唯物史观，有关隋朝农民暴动的一篇文章，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小册子，他说应该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治中国历史，发凡起例。他写的这篇文章其实什么内容也没有，只是连篇累牍地把《隋书》里隋末的天灾一条条地节抄下来，以说明隋末农民暴动是在这些天灾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是他的唯物史观。有一点是显然的，参加改组派，读《革命评论》，在我的人生长途上是一个关节点，此后我对三民主义有了自己的理解，认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和政治道路。我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

一场风暴过去，战事已远离菏泽，菏泽逐渐安定下来。1928年暑假后，菏泽各校都已正式开学。我和南华的朋友因为已在六中读了半年书，也就于秋天转入了六中。六中是省立中学，在山东省立的诸校中，是有名的好学校，校风朴实，学生勤奋，出的人才也多。几十年中，六中那一套传统的教育、管理的模式代代相传，学校是平稳、安定的，但难免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举英语教学说吧，教员的年纪都比较大，教的英语发音和朗诵古文一样，恐怕英国人都听不懂，但语法讲得很细，单词、成语记得多，写作文

也有一套。六中每年都有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六中学习的两年是艰苦的。我在南华读过一年师范，等于初一，到六中时，是初二插班生。就在我入六中的前一年，中学改了学制，旧制中学四年毕业，接大学预科，改为中学六年，高中三年，初中三年，大学取消预科。但我在初中三年（严格讲是到六中后的两年）已利用寒暑假把旧制四年的功课学完，预备考北大预科。

## 北大四年：潜心求索，一生难再

1930年6月，我六中初中毕业，决定到北京读书。当时北京叫作北平，适逢蒋、冯、阎中原大战，津浦、陇海、京汉三线皆不通，只有从菏泽往北过河，北走大名，再坐火车北上。一路几涉艰险。

初到北京的一年中，我先后在辅仁高中、私立文治高中插班念高二、高三，混了一纸高中文凭。“高中”毕业后，我报考了三个大学：北大、清华和山东大学。那时候各校自己招生，一般著名的大学都把考试日期错开，使考生可以有选择地报考两三个学校。考北大我的数学答得特好，清华的作文却作砸了，所以清华我没有被录取，考上了北大、山大。北大发榜那天，我还未敢去看，我的朋友赵体裁（子骥）跑来报信，进门就大喊：“兹全，北大你考上了！”榜贴在北大二院（马神庙街），我忙跑去看，果见榜上有名，真是高兴！我就念了北大。